

#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思考

□文 / 周 星 马建峰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福建·厦门)

[提要] 经济学家将 2008 年经济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归纳为“经济新常态”,用于概括增长乏力、经济下行压力大及经济发展重心转移等特征的世界经济。步入经济新常态,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但与此同时经济新常态也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本研究通过梳理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归纳其在不同行业领域的表现,提炼出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的机遇。在此基础上,借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探讨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举措。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经济新常态 经济增长

基金项目:福建省马克思主义消费心理学理论研究创新团队(编号 20720181104)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8年12月11日

2008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如股价下跌、金融市场动荡及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等。再者,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不断挑起的贸易战更为世界经济蒙上了阴影。在这种背景下,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处于低位,经济下行压力十分巨大。学术界普遍将 2008 年经济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归纳为“经济新常态”,用于概括后经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虽然世界经济整体低迷,再加上新近愈演愈烈的贸易战,经济学家频繁使用“消极”、“悲观”以及“下行”等词汇对世界经济予以概括。但是,中国经济在这种压力下仍能保持 7% 的 GDP 增长率,其蓬勃发展的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总体规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各个国家和地区也重新认识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与意义。因此,本文在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础上,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提出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行性路径,以便为决策制定者提供理论参考。

## 一、什么是经济新常态

(一)经济新常态的内涵。进入 21 世纪,种族主义与恐怖主义威胁以及新经济泡沫破灭等迫使美国面临了困难局面,而这种危机具有较强的长期属性,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经济现象。美国学者便把这种长期性、常态化、放缓的经济现象命名为“经济新常态”。2009 年,美国两位经济方面的专家学者(即穆罕默德·埃利安和比尔·格罗斯)首次采用“新常态”一词来概括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同时,两位学者强调经济新常态更加适用于发达经济体的各种经济现象。他们认为,经济新常态指那些在现有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各个国家或地区最可能发生的事情。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总量及不同

经济水平经济体的分析,他们认为新常态具有明显的特点,如失业率普遍偏高、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困难重重的公共财政管理以及经济增长动力和财富活力从发达国家或地区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等。

(二)经济新常态在不同行业领域的表现。虽然经济新常态反映了经济社会整体的特殊现象,具有较多的同质性。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在不同的行业领域,经济新常态的表现存在较多的差异。首先,在商业领域,突出的表现便是消费群体结构和消费者消费观念发生显著变化。受次贷危机的影响,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以更高的标准、更严格的审查制度实施次贷监管。在这种情况下,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的现象得到遏制,由此便引起商业环境的深刻变化,如企业供给结构调整、产品种类缩减以及消费者消费类别发生结构性变化、消费习惯重新调整等。这些迫使各种企业重新适应新的消费理念、新的消费模式等,在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重新进行战略选择,实现新的市场定位等;其次,在金融领域,新常态也对金融行业领域造成深刻影响。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杠杆率处在较低的水平,并且政府的政策干预也将发挥更加明显、更加有力的作用。也就是说,一系列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机构及保险公司等将被政府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资本供给处在严密的管控之下。因此,相对地,资本的有效需求将被较大程度地激发出来,进而引起较高的资本需求量。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严密的监管将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工作效率,资本的市场应用将处于高水平;再次,在工业领域,经济新常态将促使工业增速进入中低速增长区间,工业增长的动力也将转变为高投资效率驱动和多元消费结构刺激。

虽然世界各地工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但是二战后至今,世界工业总量持续增长,总体规模不断扩大。进入新常态,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复杂,要素、资源需求日益趋紧,能源和排放面临较强的排放约束,以及资本、劳动供给日趋下降等,全球工业增速放缓已成必然趋势。最后,在农业生产领域,新常态下,农副产品需求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消费者不仅满足于农副产品的温饱功能,也慢慢地向高层次、个性化及多样化进行转变。与此同时,农业经营方式也将发生重大变革,以往分散式家庭承包的小规模农业经营将失去自身活力,转而向新型经营主体的适度规模经营转变。此外,新常态下,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政府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干预作用将逐步被弱化。所以,政府部门便着手最大限度地简政放权,调动市场在各种资源的配置作用,不断激发市场活力。

##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省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及“新常态”。习近平指出,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十分关键,在发展过程中各种机遇与挑战并存。号召我们要满怀信心,结合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各种特征,与新常态相适应。自此,“新常态”被纳入执政新理念。6个月后,习近平对“新常态”进行系统的阐释。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他向包括130多家跨国公司领导人在内的世界工商领袖们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内涵、经济新常态下存在哪些机遇以及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等关键点。

自2014年开始,经济新常态在中国各领域各行业广泛传播开来,俨然成为社会各界广泛热议的话题。同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从经济风险、资源环境、市场竞争、生产要素、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出口和国际收支、消费、投资八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出现的新特征,对新常态做了最详细、最权威、最全面的解读。针对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出现的各种新情况,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指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将向形态更加高端、分工更加明确、结构更加合理的阶段演化。具体地,对经济发展动力而言,中国经济将从传统的增长点向新的增长点进行转变;对经济发展速度而言,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将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变化;对经济发展方式而言,中国经济将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变;对经济结构而言,中国经济将从以增量扩能为主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转变。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充满信心。

## 三、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机遇

经济新常态宏观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很多的机遇:

第一,经济新常态下,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出现放缓的迹象,但是经济发展的实际增量仍然处于较高水平。经过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的目标。目前,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领先势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处于举足轻重的地

位。例如,2013年中国经济的增量相当于1994年整年的经济总量。由此可以判定,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比较高,经济增长的势头十分迅猛,潜力巨大。所以,即使是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无论是在速度还是总量方面,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

第二,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迹象,但是将具有更为多样化的增长动力。有专家估计,中国经济将很快遇到上升瓶颈,增长的速度会持续回落。事实上,这种预测并不可信。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经济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的确将面临新的更加严峻的问题,各种潜在的风险的确存在,但是这种威胁或者风险,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经济虽然增速放缓,但是增速仍比较高,并且中国经济的总量很大。这些为中国经济应对各种风险,应对各种困难挑战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习近平也指出,中国正采用创新式的宏观调控思路和战略。这些为中国应对各种可能潜在的风险等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再者,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实行的是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以及工业化并行的发展战略,在发展出口贸易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可以看出,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以及庞大的经济总量是防范各种风险的前提保障,而更加多元、不同层级结构的增长动力是中国经济应对各种威胁和风险的坚刃利器。

第三,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将更加优化,产业升级更加深入。2018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率接近7%,上半年同比增速保持在6.8%。具体地,投资方面,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6.0%,民间资本参与投资活动日益频繁,同比增速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1.2个百分点。消费方面,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9.4%,表明在经历前一阶段发力之后,消费引擎阶段性转弱。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8.5%,高于同期资本形成47.1个百分点,说明增长动力持续从投资端向消费端转移。出口方面,2018年上半年,中国进口与出口的同比增速剪刀差高达6.6个百分点,货物贸易顺差已连续8个季度同比收窄。所以可以看出,随着国内市场的不断开放以及国内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逐步降低。因此,从这些结果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经济质量更高,经济结构更加完善、均衡。

第四,经济新常态下,简政放权得到有效落实,市场活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要给市场(即“看不见的手”)更多的自由度,同时更加合理利用政府(即“看得见的手”)的监督、管理作用。比如,2017年前三季度,我国新登记企业451万户,同比增长12.5%,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个体工商户941.8万户,同比增长19.5%;农民专业合作社21.8万户,同比下降4.6%。这些数据说明,我国经济市场主体活力显著,不断涌现出大量的市场主体,尤其是创新型市场主体实现飞速发展。

## 四、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何种挑战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这些挑战将对中国经济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目标造成多种阻碍。

具体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金成本升高 融资渠道较少。一方面中国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以及各种其他资源价格的不断上涨将大大减少中国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并直接导致境外投资机构减少对中国国内市场的投资规模。再加之国内资本对外输出、对外投资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原本有限的国内资本存量变得更为紧缩,资本供给日趋紧张,资本成本亦会相应提高;另一方面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向前推进,促使长期处于金融抑制的资金价格从低利率水平向均衡或是正常利率水平转换,而从数值上来看,后者无疑将高于前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市场的资本成本逐步走高,企业的融资渠道变得十分有限。这便为企业进行扩大再生产和多元化经营等形成较大障碍。

(二)人力资本发展速度减缓,创新动力不足。譬如,2001~2012年中国人力资本增长率从2001年的9.11%上升到了2003年的最大值40.36%。但是,2003年以后,中国人力资本增长率不断下降,到2012年增长率仅为2.73%。人力资本发展的速度放缓将对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造成严重阻碍,进而对中国以创新为核心的战略产生深远的抑制作用。虽然,中国每年对自主研发的资金支持不断加大,但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放缓,有效的人才供给乏力、后劲不足,使得所申请的专利数、技术转让市场合同等并没有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生产力,对劳动生产效率的直接贡献也比较小。因此,中国创新能力受到人力资本的严重制约,创新能力不足。

(三)较大的收入差距,财富分配结构不合理。一是从城乡居民收入来看,1990~2012年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基尼系数总体呈现扩大的趋势。例如,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2上升到了3.1,然而基尼系数则由0.3555上升到了0.4730。二是从收入分配来看,1990~2012年居民收入总额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由55.21%下降到43.72%;企业收入占比由1994年的42.58%下降到了2012年的33.57%,而政府收入则不仅在绝对规模上由2,937.10亿元急剧扩张到了117,253.52亿元,还在相对规模上由15.69%快速上升到了22.71%。较大的收入差距和不合理的分配结构不仅降低了个体的工作积极性,激化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将对消费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并进而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 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启示

我们需要清晰地认识到,经济新常态不单单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出各种挑战,同时在新形势下,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很多的机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因其巨大的生命力、富有前瞻性的科学判断,能够为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科学的指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严谨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是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做出的预测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所作出的分析结果保持一致,而且这也被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所证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在详细归纳、梳理、总结和吸收已有理论的基础

之上,又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见解;二是准确深刻地探究出了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从整体上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基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而且也来源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因此,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文将从深化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多边合作及自主创新四个方面阐述中国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宏伟目标的可行路径。

(一)深化制度改革,完善制度的有效激励机制。首先,政府部门应着力加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将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得合理,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且也能够缓解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促进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其次,应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释放农村经济活力。通过扩大农村农民土地产权自由度,提高农村土地流转的灵活性,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村农民土地经营的积极性,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而且也将刺激农村经济市场的发展,为农民增产增收注入新的活力。

(二)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扩大投资和消费的需求。新型城镇化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比如,新型城镇化更加重视劳动要素的合理配置、注重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同时新型城镇化也突出强调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所以,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将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新的动力。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将有助于刺激投资需求的提升,其不仅包括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且更深层次地也将有助于激发不同产业的投资。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并非一种个体功能,而是即时且全面的集体功能。”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也将扩大已有消费规模并激发新的消费的出现,新型城镇化将有助于农村居民向城镇进行转移定居,农村居民的城镇化不仅扩大了消费规模,而且也将有助于实现消费升级,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所以,新型城镇化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实现持续增长。

(三)加强国际多边合作,促进对外贸易和投资。进入到2018年,美国在全世界挑起的贸易战愈演愈烈,美国单方面的不理智的行为甚至是野蛮的行径为原本有回暖迹象的世界经济再次蒙上了一层阴影。中美贸易摩擦不仅为双方,也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多个主要经济体所开展的贸易摩擦也为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开展国际深度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加强国际间多边合作不仅可以减少国际贸易和投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搜寻成本,而且国际多边合作也将有助于增进彼此的了解,深化彼此的信任,为实现不同经济体间的良好合作打下坚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加强国际间合作能够进一步扩大其他经济体对中国的投资力度与总体规模,减少因贸易摩擦而引起的高额成本。与此同时,

DOI:10.13665/j.cnki.hzjykj.2019.05.002

# 高铁网络下广东省际经济联系测度分析

□文 / 叶燕霞 吴浩存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广东·广州)

**[提要]** 运用经济引力模型,从高铁网络的角度,对广东省 21 个地级市的经济联系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高铁网络下,广东省各地市的省际经济联系量得到显著提高,存在扩散效应、叠加效应、极化效应;(2)经济联系强度形成由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组成的强经济联系中心群,并由经济联系中心向周边城市递减,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城市经济联系量较低;(3)广东省与全国各省份的经济联系强度构成“三环”分布格局,广西、湖南、福建是广东省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从而,为广东省各地市区域经济合作策略的制定及高铁建设方案的制订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广东; 高铁网络; 经济联系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收录日期:** 2018 年 12 月 14 日

## 一、引言

高铁的开通极大地缩短了地区之间的空间距离,高铁正在快速地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增大了城市之间的信息流、资金流、货物流,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由此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研究。陶菁等人对长江经济带的 39 个城市的经济联系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发现宁波与长三角地区

的城市地缘经济关系呈竞争性由强变弱的趋势。李阿萌对有无高铁的情况下,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经济联系的变化格局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虽然高铁开通后各地市的经济联系增强,但各地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差异也增大。史琴琴等人对山西省县域的可达性和经济联系进行研究,发现山西省县域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呈“大”字形,初步形成“一核一圈三群”的空间联系格局。王

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也为中国的出口开拓新的市场、提高中国对外出口规模、扩大对外投资力度等提供良好的合作平台。所以,增强国际合作的频率,深化国际合作,开展多边贸易同样能够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粗放式资源高消耗型的增长方式不同,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是一种高质量、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以及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说,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更强调创新导向、创新驱动,不仅注重生产技术的开发与创新,而且也更加强调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经济制度的不断变革。所以,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促进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技术的不断创新,并逐步完善经济结构,这些共同构成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方面政府要为科研单位、科研院所提供资金支持,资助科研院所开展基础型研究和应用型研究,并且也要加大人才培养、开发力度,同时也要为高层次人才的引进等提供制度支持与物质支持,促进人力资本向经济市场产品和效益的高效率转化,不断提高经济市场活力;另一方面

政府也要激发社会对创新性产品或服务的有效消费需求。这就要求政府部门采取多种举措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合理进行财富再分配,并且也要强化城乡居民的消费意识。通过这些措施,促进创新型产品高效率地投入到市场经济体系中,激发经济增长活力。

## 主要参考文献:

- [1]李伟. 适应新常态迈向新阶段[J]. 中国经济报告, 2015(2).
- [2]田俊荣, 吴秋余. 新常态, 新在哪[J]. 西部大开发, 2014(12).
- [3]王颖, 何况, WANG Ying, 等.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绿色发展道路探讨[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4).
- [4]徐琴.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的意义与局限[J]. 哲学研究, 2009(5).
- [5]朱钟棣.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M]. 人民出版社, 2004.